

# 语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 概念梳理、角色界定、理论思考

赵 芑<sup>1</sup>, 田海龙<sup>2</sup>

(1. 天津商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400; 2.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意识形态”不仅是政治研究中的概念,也是语言研究中的概念。意识形态与语言使用的紧密联系使其在近30年的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对“意识形态”概念在语言研究中的含义进行梳理,发现其具有四个明显特征,即“心理意识”特征、“社会立场”特征、“权力关系”特征和“话语体现”特征。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界定出“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扮演的三个角色:1)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意识形态是语言研究揭示的内容;2)在语用学领域它是论证的课题;3)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它是语言研究借助的工具。这些讨论突显语言研究将语言运用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的趋势,有助于探究言说者的能动性,通过探究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的角色和作用促进语言学理论创新。

**关键词:**意识形态;能动性;社会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语用学

## Ideology in Linguistic Studies: Scrutinizing the Concept , Investigating Its Role and Reflecting 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ZHAO Peng<sup>1</sup> , TIAN Hailong<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 Tianjin 300400;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 Jinan 250358)

**Abstract:** “Ideology”, normally a concept in political studies, is also a key concern in sociolinguistics, pragma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Reviewing relevant studies of ideology in these linguistic field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four features of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linguistic studies, namely, ideology being characteristic in terms of consciousness, social position, power relation, and discourse realization. The article continues its investigation by highlighting three roles ideology plays in linguistic studies, namely, ideology being the content linguistic study is to reveal, the issues linguistic study investigates, and the tool by which linguistic research is to be done. Finally, the article relates what is discussed here with relevant issues at home, proposing that further concern of ideology in linguistic studies is needed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peaker’s agency in the process of decoding the social meaning of language use as well as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Key words:** ideology; agency; sociolinguistic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ragmatics

### 1. 引言

“意识形态”一般被认为是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广泛使用的术语。例如,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统治阶级为自己造出的关于自身以及自身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Marx and Engels [1845] 1970)。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将

这种歪曲、颠倒现实且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虚假意识”强加给被统治阶级,借此把自身建构为社会全体成员理所当然的代表,将自己阶级的特殊利益建构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使被统治阶级误认为自己的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新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以再现的方式来建构现实的认知框架,它建构一种个人与其真实生存条件之间的想象关系,并以一定的物质存在为前提,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Althusser 1971)。如此认识意识形态的作用,新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产阶级通过教育、媒体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社会运作和日常实践,潜移默化地将其意识形态渗透于该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不仅使被统治阶级在精神和思想上臣服于统治阶级,而且将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主体。

与政治学研究中将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政治学说”和各种“主义”联系在一起(Gal & Irvine 2019: 13)进行研究不同,语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更多的与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语言使用相关。那么,意识形态的语言研究在目前的总体状况如何?“意识形态”概念在语言研究中有什么特殊含义?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的角色是什么?意识形态的语言研究对语言学的理论发展有哪些潜在的贡献?对国内的语言研究有哪些启示?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个概要性的回答,抛砖引玉,以期引发更深入的研究。

## 2. 意识形态的语言研究概况

语言学相关领域涉及“意识形态”的研究可称为“意识形态的语言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福勒和克瑞斯反思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言本体研究,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大众媒体中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揭示出特定媒体在对特定事件进行报道中持有的特定价值取向及其意识形态意义(Fowler & Kress 1979),其中体现的意识形态语言研究所遵循的一些理论主张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一书(Kress & Hodge 1979)中得到系统阐述。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范代克和沃达克借鉴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运用修辞和论辩的分析方法,对西方一些国家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将那些隐含在话语中不易为人察觉的种族歧视意识形态意义暴露在大众面前(van Dijk 1991; Reisigl & Wodak 2001),最终形成批评话语分析领域意识形态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意识形态的多学科研究》(van Dijk 1998)。

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研究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1979)提出“语言意识形态”议题,被认为是将意识形态概念引入社会语言学特别是语言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突破”,开创了思考语言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新思路”(Gal & Irvine 2019: 13)。之后的20年见证了该领域语言意识形态研究的快速发展,出版了一系列主题文集(如Kroskrity 2000; Schieffelin *et. al.* 1998; Blommaert 1999)。《语用学》期刊还在美国人类学会1991年芝加哥年会和1993年华盛顿年会组织的意识形态专题研讨会基础上出版了两个专辑,分别为“语言意识形态”专辑(1992, 2: 235-453)和“构建语言与公众”专辑(1995, 5: 129-282)。进入21世纪,社会语言学领域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与日俱增。例如,《社会语言学刊》前9卷(1997-2005)的论文中,只有三篇文章的题目含有“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第10卷(2006)题目含有“意识形态”的文章增加到三篇,而接下来的8卷(2007-2014)每一年都至少有一篇文章题目中出现了“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贝尔(Bell 2016)的这个统计表明,语言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范式,对社会语言学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其发展出来的视角已经增强了社会语言学关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研究对批评和意识形态的敏感度,而且这种敏感度还在进一步渗透到互动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变异研究之中(Coupland 2016: 11)。

意识形态的语言研究还体现在语言规划与政策的研究方面。例如,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在选择哪些语言作为国家语言时,就体现出其在语言规划上的意识形态倾向,其所确定的借以选择语言的标准,“与其说是一个经验的语言事实,不如说是一个意识形态过程”(Woolard 1998: 21)。除此之外,“意识形态”概念也促使学者在语言政策研究中关注语言与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这些非语言因素的紧密关系。这些非语言因素被引入语言政策的制定当中,更加凸显了语言承载意识形态的特征,因为不论体现哪种意识形态的语言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形塑交际实践并借此进一步影响语言政策(Wee 2016: 333)。

### 3. “意识形态”概念在语言研究中的含义

语言学不同研究领域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有着基本共识,认为其体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特征上面。首先,“意识形态”被认为与“意识”和“认知”相关,是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主观再现。基于此,一些社会语言学家将我们关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如知识)认为是意识形态,这些知识可以帮助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创造性地解释其所处的语境以及后续采取的社会活动(Gal & Irvine 2019: 14)。这一点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学中也得到认可,如范代克(van Dijk 1998: 9)认识到意识形态概念具有“认知”的特性,是“一个囊括了关于社会的各种认识的心理框架”,维索尔伦(Verschuere 2012: 7)也指出“意识形态”包括“意义的基本模式、解释的框架、世界观以及日常思考和解释的形式”。

第二,“意识形态”的基础是社会活动者特定的社会立场。在这方面,意识形态的“意识”特性和“心理”特征上升到“思想”或“信仰”的层次,将意识形态与自然科学中称作“知识”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真实认识<sup>①</sup>区别开来。例如,社会语言学学者沃勒德(Woolard 1998: 6)曾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源自并植根于某一特定立场的利益和经历,同时也是这一特定利益和经历的反应和回应”。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也在认识到意识形态具有“认知”特性的基础上,指出意识形态“不仅产出关于社会的认识,而且具有调节社会实践的功能”(van Dijk 1998: 9)。语用学者的表述更为深刻,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与“思想、信仰和意见”相关,还包括“意义的基本模式、解释的框架、世界观以及日常思考和解释的形式”(Verschuere 2012: 7)。维索尔伦在这里强调的实际上也是社会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学者所认识的,意识形态不仅是一个心理认知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概念,是一个基于社会立场的主观认知。

第三,意识形态是一个与“权力”和“斗争”相关联的概念。由于“意识形态”是一种基于特殊利益的主观认知,因此,如果某一种意识形态试图实现它所自诩的代表“普遍真相”的目的,它就需要借助一定的权力,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权力(Woolard 1998: 7)。同样是因为意识形态与权力紧密相关,意识形态“作为思想、话语和表意实践”也“服务于为了获得和保持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同上)。对此,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是确立和保持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Wodak 2001: 10);而语用学则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所服务的这种权力关系是存在于“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群体层级上彼此间体现在公共地位上的等级关系,因此,不仅拥有权力的群体具有意识形态,没有权力的群体也被认为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Verschuere 2012: 9)。

第四,意识形态被认为存在于语言使用之中,其含义甚至可以被“话语”的概念所涵盖(Woolard 1998: 7)。意识形态反映或折射社会事实的形式是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因此,批评话语分析可以通过分析不同社会主体的语言运用形式洞察其隐含在语言运用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在

<sup>①</sup> 当然,自然科学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于认识主体的各种局限也并非完全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认识。

这方面,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领域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语用学家维索尔伦就指出,意识形态最明显的体现形式就是语言使用或话语( Verschueren 2012: 17),而社会语言学家则在用“语言意识形态”( Silverstein 1979)的概念特指“关于语言交际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运作场所”( Gal & Irvine 2019)的概念,特别表明意识形态发生在人们运用语言交流的过程之中。

以上四点是语言研究领域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一般认识。然而,由于研究目的不同,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领域关于“意识形态”的认识也有不同的侧重。例如,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比较强调“意识形态”的“创造力”。“意识形态”在戈尔和厄文( Gal & Irvine 2019: 14)看来可以帮助人们对交际情景做出“创造性的阐释”并对后续采取的社会活动发挥积极作用,而在维索尔伦( Verschueren 2012: 19)看来,意识形态一旦被应用就可以在确认态度、解释事物和使活动合法化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些不同,也体现出语言研究领域应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特征,或曰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的不同角色。

#### 4. 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的角色

##### 4.1 意识形态是语言研究试图揭示的内容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一方面是因为批评话语分析将揭示语言使用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包括与之相关联的权力关系)作为其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使命”使其与这一任务紧密相连。

就前者而言,其认识论基础是批评话语分析认为社会现实与话语建构的社会现实并非总是一致。例如,费尔克劳( Fairclough 2006)列举了关于全球化的不同声音,它们分别来自学术研究、媒体、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机构,甚至来自普通民众,这些声音代表着不同的立场,有客观主义立场、修辞主义立场,还有社会建构主义立场。这些代表不同立场的关于全球化的声音(话语)并非都能够体现全球化的实际现状,而且这些话语之间也体现为一种竞争关系。费尔克劳( Fairclough 2006)特别分析了一种对实际发生的全球化进行论述的“新自由主义话语”,这种“全球主义”话语将全球化再现为市场的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还无人可以控制。这种全球主义话语认为全球化使人人受益,并推进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然而,全球主义话语并不是实际发生的全球化的真实写照,而是美国等国家推行自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种说辞。在这个意义上,全球主义话语实际上体现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由符合其利益的国家提出并由其主导在全球范围推广。

就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使命”而言,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对话语进行语言学分析来揭露语言使用中存在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以期实现社会变革。它之所以对语言运用(话语)进行批评性分析,其目的就是揭示那些隐含在语言使用中的、不易被察觉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意义(如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能够唤起民众的觉悟,改变他们被这种意识形态奴役的现状。正如费尔克劳和沃达克所讲,“语言使用的具体方式体现着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人们对此往往无法察觉。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将这些含混的话语问题明朗化”( Fairclough & Wodak 2012: 17)。可见,批评话语分析体现着一种明显的参与政治活动的特征。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实践或政治承诺预设了语言使用中的意识形态成为其语言研究所要揭示的主要内容。

##### 4.2 意识形态是语言研究需要论证的课题

与批评话语分析不同,语用学将意识形态视为语言研究论证的课题,并致力于探究什么是意识形态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如何产生。这种“基于语言或话语的实证意识形态研究”( Verschueren

2012) 强调要依据一些基本规则( rules) 对语言运用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论证。例如,维索尔伦( Verschuereen 2012: 22 - 28) 提出对意识形态进行实证研究首先要列出研究问题,之后要在自我监控和反思的状态下收集足够数量的语料,而且这些语料还需针对具体的研究目的,并且结构成分丰富、语体各异。维索尔伦还就具体的研究方法提出四个分析指南( guidelines) ,包括详细研读收集到的语料,了解语料的背景等等,其中一些指南包含了可依据的详细研究步骤( procedures) ,以及关于注意事项的告诫( caveats) 。

维索尔伦认为意识形态存在于语言运用之中,是意义的基本模式,也是解释意义所依据的框架基础。他主张使用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判定意识形态在语言运用中的存在,并提出意识形态语言研究需要遵循一套准则和规则、通过一套步骤来发现意识形态存在于语言运用之中的证据。在这方面,他提出四个指南,其中第三个指南更具核心地位。

第三个指南涉及意义生成的动态性,与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相关,包括七个彼此相关联的步骤。第一步是确定所分析研究的话语属于什么活动类别或言语事件类别,有哪些主要的言语行为,有哪些语言游戏,以便提供一个普遍性的阐释框架。第二步要分析语言、语码和文体在话语中是如何使用的,包括 1) 使用了哪些语言,这些语言与社会/社区语境有何关系 2) 使用了哪些语码,是否有语码转换发生,是否涉及特殊的交际文体,以及 3) 该文体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等等。第三步是分析信息结构的表现形式,特别要分析语言形式如何在词汇、句子、超句三个层面组合在一起形成信息结构。第四步要系统观察隐性意义的表达方式,如要找出体现预设的表达式和结构,以及逻辑含义、蕴含和言外之意,还要找出诸如明喻、代喻、隐喻、反讽的修辞手段。第五步是观察互动,例如,对于会话这类明显的互动语料要观察互动进行的结构和双方进行互动的方式,而对于看上去像是独白但却是互动的语料,要尽力找出对话的组织结构,即那些隐形的互动方式。第六步是观察元语用功能的实施情况,特别是找出那些能够表明元语用的副词、附加疑问句、插入语、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等等。第七步是在前几个步骤观察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明确任何可能产生意义的策略,例如显性策略和隐性策略互动有可能产生的新的意义生成策略。关于以上七个步骤的具体实施,维索尔伦也给出告诫,指出形式和功能的关系不是确定的,因此这些步骤的实施也不可能采取一种机械呆板的方式,同时,由于形式和功能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也需要注意意识形态研究具有的比较和对比特征。

#### 4.3 意识形态是语言研究可以借助的分析工具

“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作为概念性分析工具可以用来阐释意义的解读过程。这方面系统性的理论成果来自社会语言学及语言人类学的研究( 如 Silverstein 1979 2003; Gal & Irvine 2019; 亦见赵芃 2021) ,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 如 van Dijk 2008 2009; 亦见 Tian 2011) 。篇幅所限,下面从两个方面简要讨论戈尔和厄文的研究。

首先,“意识形态”概念深化了符号为什么可以成为符号这一问题。在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看来,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以及符号与物体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可以成为指向关系、象似关系、象征关系,是由于“解释项”猜想( conjecture) 的结果。那么,解释项依据什么“猜想”? 戈尔和厄文认为是依据“意识形态”,并通过由比较和对比构成的“符号过程”实现。她们( Gal & Irvine 2019: 19) 以法语词 stupide 中的 u 音的正确发音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发音正确被认为具有法国人的特质,但这个语音变体之所以“指向”法国人的特质,则是因为“解释项”从事“猜想”这一认知活动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已有的知识导致对这个语言变体给予特殊关注,并将其与周边的其他符号区别开来。这些知识背景、兴趣利益以及推想,即是阐释符号为什么成为符号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戈尔和厄文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发展了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

其次,“意识形态”概念阐释了创造知识的过程。戈尔和厄文提出一套概念,包括“呈符化(rhematization)”“分形递归性(fractal recursivity)”“区分轴(axis of differentiation)”“抹除(erasure)”,认为基于一种“猜想”的符号关系(如指向关系)可以在下一个“猜想”中被认为是另一种符号关系(如象似关系)这时,意识形态的作用就不仅发生在“猜想”的过程之中,而且发生在对比语言形式及其导致的对社会意义的区分之中(Irvine 2001; Irvine & Gal 2000)。例如,她们发现19世纪的一篇游记中“土地”这一语言符号可以指向“乡村”这一物体,然而,这篇游记的作者却表达了当她从西部跨越阿尔皮斯山脉之后对东部土地贫瘠的惊愕。戈尔和厄文(Gal & Irvine 2019: 112-137)认为,当社会活动者有意通过对比“土地”的贫瘠与否(区分轴)来显示特质(qualia)的不同时,这种符号与物体的“指向关系”就转换成了符号与物体所体现的特质之间的“象似关系”。符号关系在这个“呈符化”的符号过程中之所以发生改变,是因为这位游客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结果。她选择什么样的“区分轴”在不断的比较和区分过程中,选择注意什么,抹除什么,将比较和区分的关系投射到哪些层面(分形递归)都是基于社会活动者的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符号的不同特质被“挖掘”出来,并且被投射到这些符号被认为可以指向的不同现象上面,而社会活动者进行比较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具体特质是否处于区分轴的两端,是否可以被投射到下一层级或上一层级,或是否可以被抹除(Gal & Irvine 2019: 19)。在这个意义上,符号过程即是一个被戈尔和厄文(Gal & Irvine 2019: 14)称作“意识形态工作(ideological work)”的意识形态发挥创造性作用的过程。

## 5. 启示与思考

以上关于意识形态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定义及其角色的讨论主要涉及国外的相关研究,但这并非表明国内的语言学研究没有关注语言意识形态问题。事实上,国内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 and 语用学研究对此都有所涉及。例如,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辛斌(2018)借助“体裁互文性”的概念,对南中国海仲裁案中法律机构内“仲裁”和“诉讼”的互话语问题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揭示出该案妖魔化中国和损害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的意识形态意义。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谷小娟、张迈曾(2007)曾将戈尔和厄文关于语言意识形态的早期研究与语体变异研究联系起来,认为其是语体变异研究的一个主要路径。在语用学研究领域,虽然与维索尔伦“实证意识形态研究”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但是涉及语言运用中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或多或少也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例如,陈新仁(2018)在对房产广告的批评语用分析中就发现,广告商通过顺应目标人群的特定心理需求来达到促销房产的目的。这里所说的“心理”从广义上讲体现出“意识形态”概念所含有的“意识”“认知”等基本内容。

然而,以本文讨论的内容为基础思考国内语言学相关研究,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个有益的启示,即语言研究如能对语言使用者个体的“能动性(agency)”进一步深入研究,将可开辟理论创新的新天地。“能动性”是语言人类学从社会学引入的一个概念,指语言使用者在以言行事过程中与制约其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具有相互构建的关系(Ahearn 2001)。变异社会语言学从以拉波夫为代表的第一个浪潮发展到以米尔罗伊和艾克特为代表的第二个浪潮(Eckert 2012),将“能动性”的概念应用到对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关系的阐释之中,并借此来揭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和简单的共变关系,而是通过言说者“能动性”来调节的。在这个意义上,“能动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言说者个体对交际行为及其后果不确定性的影响。与此形成呼应,戈尔和厄文在20世纪末(Gal 1998; Gal & Irvine 1995)就开始从皮尔斯符号学的角度探究符号与物体之间如何通过解释项的“猜想”呈现出指向关系和象似关系。她们将这个“猜想”的过程视为“意识形态”过程,并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象似关系”上面,通过借鉴西尔弗斯坦关于指向关系的研究,在其“指向

性”“指向秩序”(Silverstein 1979 2003) 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呈符化”的概念,揭示了指向关系在向象似关系转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机制,突显出个体能动性在语言运用中的特殊作用。戈尔和厄文基于符号学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将语言意识形态作为阐释言说者个体语言风格实践的契机,不仅代表了社会语言学注重个体语言特征研究的趋势,而且实现了对西尔弗斯坦“指向性”概念在符号学方面的超越(Gal 2016; Woolard 2021; 田海龙 2022)。

以此反观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可以发现相关的研究虽然认识到语言使用者的“认知(cognition)”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但是这种“认知”还停留在“心智(mental)”层面,将言说者作为“社会人”(Halliday 1978)的研究还不够透彻,对其发挥能动性的机制还认识不足。国内认知语言学的一些新成果,如提倡批评认知语言学与语料库结合以及倡导采用心理实验的方法进行批评话语研究的“批评认知”研究路径(张辉、张艳敏 2020),以及强调“识解的本质及其与语法的关系”的“社会认知”研究路径(文旭 2019: 299) 如果能够在关注“心智”“记忆”“语法”这些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础上,在注重量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同时,关注社会认知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个体能动性如何导致交际后果,探究这种后果为什么具有不确定性、偶然性、临时性的特征,将会在客观、真实和科学地呈现言说者解读话语意义过程的同时,更为深入地阐释言说者意识形态调节(mediate)语言形式和交际后果的机制。从本文讨论的意识形态语言研究来看,某个语言形式是否华丽、是否幽默,它的使用是否可以建构出某种形象或达到某种目的,完全是语言使用者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是其语言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言说者对语言形式的认识,构成了连接语言使用与交际后果的“中介体”,发挥着“调节力(mediating force)”(Woolard 2021),其后果并非是认知语言学的科学实验所能整齐划一地呈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语言意识形态的研究,即是关于人的能动性的研究。这体现着语言学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将语言运用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的发展方向(田海龙、赵芑 2021; 赵芑、田海龙 2022)。

## 6. 结语

将“意识形态”的概念引入语言研究,语言学家,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家、语用学家和批评话语分析家对社会生活中的语言使用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有可能更为清晰地阐释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特别是社会活动者作为“社会人”(Halliday 1978)通过语言进行社会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能动机制。本文基于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提出“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的基本含义,并以此为出发点认为“意识形态”可以成为语言研究揭示的内容、论证的课题和借助的分析工具,已经展示出语言学领域展开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广阔空间,同时也预设出对于丰富语言学理论的巨大潜力。在语言学研究越来越注重将语言运用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的背景下,意识形态的语言学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这也为国内的语言学研究内容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相信国内学界同仁在这方面会取得更为深入的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1] Ahearn, L. Agency [C]//Duranti, A. *Key Term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1.
- [2] Althusser, L.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C]//Althusser, L.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 [3] Bell, A. Succeeding waves: Seeking sociolinguistic the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 Coupland, N.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4] Blommaert, J. *Language Ideological Debates*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9.

- [5] Coupland , N. Introduction: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sociolinguistics [C]//Coupland , N.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6] Eckert , P. Three waves of variation studies: The emergence of meaning in the study of variation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2 ,41: 87 – 100.
- [7] Fairclough , N.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8] Fairclough , N. & R. 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Tian , H. & P. Zha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2.
- [9] Fowler , R. & G. Kress. Critical linguistics [C]//Fowler , R. , Kress , G. , Hodge , B. & T. Trew.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 [10] Gal , S. Multiplicity and contention among language ideologies [C]//Schieffelin , B. , Woolard , K & P. Kroskrity. *Language Ideologies: Practice and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1] Gal , S. Socio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 [C]//Coupland , N.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12] Gal , S. & J. Irvine. The boundaries of languages and disciplines: How ideologies construct difference [J]. *Social Research* ,1995 ,62( 4) : 967 – 1001.
- [13] Gal , S. & J. Irvine. *Signs of Difference: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Social Lif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14] Halliday , M. *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Arnold ,1978.
- [15] Irvine , J. Style as distinctiveness: The culture and ideology of 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 [C]// Penelope , E. & J. Rickford. *Style an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6] Irvine , J. & S. Gal. Language ideology and 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 [C]//Kroskrity , P. *Regimes of Language: Ideologies , Politics , and Identities*. Santa Fe ,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0.
- [17] Kress , G. & R. Hodge. *Language as Ideolog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9.
- [18] Kroskrity , P. *Regimes of Language: Ideologies , Politics , and Identities* [C]. Santa Fe ,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0.
- [19] Marx , K. & F.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1845] 1970.
- [20] Reisigl , M. & R. Wodak.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Rhetoric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 [21] Schieffelin , B. , Woolard , K. & P. Kroskrity. *Language Ideologies: Practice and Theory*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2] Silverstein , M.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inguistic ideology [C]//Clyne , P. , Flaks , W. & C. Hofbauer. *The Elements: A Parasession on Linguistic Units and Levels*.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9.
- [23] Silverstein , M.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 [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 2003 ,23: 193 – 229.
- [24] Tian , H. Joint review of Van Dijk' s *Discourse and Context and Society and Discourse* [J]. *Language in Society* , 2011 ,40( 1) : 116 – 121.
- [25] Van Dijk , T. A. *Racism and the Press* [M]. London: Routledge ,1991.
- [26] Van Dijk , T. A.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 [27] Van Dijk , T. A.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8] Van Dijk , T. A.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9] Verschueren, J.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Pragmatic Guidelines for Empirical Resear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30] Wee, L. Are there zombies in language policy?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s and the continued vitality of (apparently) defunct concepts [C]//Coupland, C.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31] Wodak, R. What CDA is about — 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 [C]//Wodak, R. & M. Meyer.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32] Woolard, K. Introduction: Language ideology as a field of inquiry [C]//Schieffelin, B., Woolard, K. & P. Kroskrity. *Language Ideologies: Practice and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3] Woolard, K. Language ideology [C]//Stanlaw, J.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2021.
- [34] 陈新仁. 商业广告“身份套路”的批评语用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 39(5): 24-33.
- [35] 谷小娟, 张迈曾. 语体变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 (6): 7-9.
- [36] 田海龙. 变异社会语言学的风格研究——兼谈与修辞学风格研究的互鉴[J]. 当代修辞学, 2022, (4): 11-21.
- [37] 田海龙, 赵芃. 社会语言学新发展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 [38] 文旭. 基于“社会认知”的社会认知语言学[J]. 现代外语, 2019, 42(3): 293-305.
- [39] 辛斌. 体裁互文性的话语分析——以南中国海仲裁案为例[J]. 外国语, 2018, 41(5): 96-103.
- [40] 张辉, 张艳敏. 批评认知语言学: 理论源流、认知基础与研究方法[J]. 现代外语, 2020, 43(5): 628-640.
- [41] 赵芃. 从“再情景化”到“指向秩序”——批评话语研究概念性工具的新发展[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 (3): 23-30.
- [42] 赵芃, 田海龙. 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发展[J]. 现代外语, 2022, 45(1): 137-147.

收稿日期: 2021-07-08

作者简介: 赵芃,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批评话语研究。  
田海龙,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批评话语研究。

##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英文版)》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著  
ISBN: 978-7-5446-7134-7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开本: 16  
定价: 125.00元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英文版)》为语言文字方面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学习、生活、工作等领域运用中文完成交际的语言水平等级。本书通过详细的等级描述对不同语言水平进行了介绍,让学习者能够对自身的语言水平产生准确的预估,而教育机构也能依据这些等级描述及拼音表、汉字表、词汇表等进行相应的课程教学。